

浅谈张政烺先生的版本目录学研究

汪桂海

张政烺先生是传统文史研究领域成就卓著的学者。他博览群籍，好学深思，对每一个问题的讨论，都能穷尽史料，考证缜密。他治学范围广泛，在考古、历史、古文字、古文献，以及小说史等领域都有杰出贡献，在学术界享有盛誉，为许多后来者所景仰。

张先生关于版本目录学的文章不多，只有《王逸集牙签考证》、《读〈相台书塾刊正九经三传沿革例〉》两篇。上世纪三四十年代，张先生曾在前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图书资料室工作了约十年，他负责图书的采购。工作的需要，促使他对研究所收藏的古书作了全面的阅读，同时，他又留意古书的版本。在采购图书过程中，他饱览善本书，了解到某些古书刊刻的脉络，提高了对古书版本及其流传的知识和辨别能力。两篇文章都是在这一时期撰写的。前者撰写于1943年至1945年，并于1945年发表于《六同别录》（《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外编》第三种）。后者撰写于1943年，于1991年发表于《中国与日本文化研究》第一集（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）。现在，这两篇文章都已收入中华书局出版的《张政烺文史论集》一书，查找阅读都比较方便。

先说《王逸集牙签考证》。

《后汉书·王逸传》云王逸“又作《汉诗》百二十三篇”，自来注解及作《补后汉艺文志》者，皆不知为何书。例如，顾櫰三《补后汉书艺文志》卷九别集类上收录《侍中王逸集》二卷，注云：“逸字叔师，南郡宜城人，著有书论、杂文二十一篇、《汉诗》百二十三篇。櫰三案，今可考者有《机赋》……”云云。顾氏显然不知《汉诗》百二十三篇为怎样的一部书，只好在此条下据本传记载，略为转述，似以为《汉诗》即《王逸集》之一部分，然又不敢明确。姚振宗《后汉艺文志》集部文史类收录王逸《汉诗》百二十篇，依据的也是范曄《后汉书·王逸传》，也未作深论。前人的这些认识都是受材料限制所致。

黄浚《衡斋金石识小录》卷下著录“汉王公逸象牙书签”一枚，张政烺先生认为，此实悬系于《王逸集》书帙外的签牌，时代当属魏晋或北朝。此牙签正反两面皆有文字，记王逸的著述情况，其中有“又作《汉书》一百二十三篇”的话，张先生由此联系《王逸传》的记载，推定“《汉诗》百二十三篇”应为“《汉书》百二十三篇”，“诗”乃“书”之讹误。《汉书》百二十三篇，当指《东观汉记》而言。“（班固）《汉书》成于东观，实一代之国史。《汉记》草创又始班固，其书仅有小题而无大名，别本流行袭班书之旧称，自无足异。惟一时相同之书名繁多，则必藉篇数以示分别。”牙签云“又作《汉书》一百二十三篇”，犹云又参与撰写《东观汉记》，非必一百二十三篇皆出自王逸之手。

东汉从明帝时起，历章、安、桓、灵、献帝数朝，陆续组织人员编撰了一部官修史书《汉记》，又名《东观汉记》，先后参与撰修的学者很多。刘知几《史通·史官建置篇》说，“旧史”记载当时王逸也是与修人员之一，但他又认为王逸“研寻章句，儒生之腐者也”，不能“错综时事，裁成国典，”对王逸是否确实参与其事提出了怀疑。王逸于安帝、顺帝之世曾为校书郎。其时刘珍等正奉诏杂作纪表以及名

臣节士、儒林、外戚诸传，王逸参与著作，是很自然的事情。然由于史籍散佚，无从取证，此事无法落实，遂使王逸参与《东观汉记》编撰的史实沈霾千年，无人知之。张先生的考证足以纠正范曄《后汉书》之讹，祛解刘知几之疑，还历史以真面目。

关于此牙签，张先生进一步指出，它与范曄《后汉书》本传的记载大致相近，但从铭文字体推断，牙签当不出于范曄书，二者应属同源而彼此不相袭。他根据《隋书·经籍志》“梁有《王逸集》二卷，录一卷。亡。”的记载，认为范书与牙签铭文皆源自于“录”。此录即荀勖校理晋内府藏书时所撰写的每一种书的叙录。

众所周知，魏晋南北朝时期各家撰述的《后汉书》，主要取材于《东观汉记》，范曄《后汉书》也是如此。但《东观汉记》无《文苑传》，且经董卓之乱，旧文散佚，有关东汉文人的史料，东观即有所储亦已荡然无凭。范曄《后汉书·文苑传》的史料来自哪里，后人茫然。

另一个问题是，魏晋南北朝时期是我国传统目录学发展的重要阶段，出现过多次规模较大的图书整理，产生了许多重要的目录学著作，但没有一部完整的流传下来，使后人在研究这段目录学史时遇到材料短缺的困难，有的问题不容易理清。例如，《隋书·经籍志》说，“魏秘书郎郑默始制《中经》。秘书监荀勖又因《中经》，更著《新簿》，……但录题及言，盛以缥囊，书用细素。至于作者之意，无所论辩。”，又说魏晋诸目录，“不能辨其流别，但记书名而已。”这条记载，很容易让后人认为郑默《中经簿》、荀勖《新簿》都是只著录书名，而无解题或叙录。余嘉锡先生即持此观点，他在《目录学发微》中说：“‘但录题’者，盖谓但记书名。‘盛以缥囊，书用细素’，则惟侈陈装饰。是其书并无解题。而今《穆天子传》载有勖等校上序一篇，其体略如刘向《别录》，与《隋志》之言不合。据《晋书》勖传，则勖之校书，起于得汲冢古文。或勖第于汲冢书撰有叙录，他书则否也。”余先生是目录学研究的专家，他从三十年代起在北京各大学讲授目录学，此书乃据讲义整理而成，其观点影响很大。

张先生认为事实并非如此。首先，他根据王隐《晋书》佚文记载郑默“删省旧文，除其浮秽，著《中经簿》。”以及《文选》李善注云荀勖“与中书令张华依刘向《别录》整理错乱，又得汲冢竹书，身自撰次以为《中经》”，这两条材料，判定产生于魏、晋时期的两部目录实际皆有叙录。其次，他又推定《隋书·经籍志》史部簿录类所著录的荀勖撰《（杂）[新]撰文章家集叙》十卷，“即魏晋新撰书录之一部分。中古重文，流行独久，《史》、《汉》、《三国》无《文苑传》，范曄创意为之，大抵依傍此书。而他传具文章篇数者，其辞亦多本于此。”《新撰文章家集叙》在《三国志》裴松之注、《世说新语》刘孝标注等书中有征引，皆简称《文章叙录》。张先生曾就涉猎所及，搜辑叙录佚文数十篇，《王逸集》牙签铭文也是其中一篇。至此，郑、荀两部簿录有无叙录，范曄《后汉书·文苑传》资料来源等文献、目录研究上的重要问题，得到一个圆满的答案。这是张先生的贡献。

张先生在版本研究方面的成就也是有目共睹的。

传世王逸注《楚辞章句》的最早刻本为明仿宋刊洪兴祖补注本，《四部丛刊》即影此本。全书共十七卷，卷十七为《九思》。张先生发现卷十七题“汉侍中南郡王逸叔师作”，与前十六卷题“校书郎臣王

逸上”者不同，而与《隋书·经籍志》所记王逸《正部论》的衔名相类。卷十七应是后人从《王逸集》中选录附入的，故而一仍《集》内原署“汉侍中”的衔名，与前十六卷之衔名不合。其他的明刻本，如正德十三年黄省曾、高第刻本，隆庆五年豫章夫容馆刻本等，其卷十七的衔名皆已窜改，分别改题为“后汉校书郎南郡王逸叔师章句”、“汉王逸章句”，王逸所作的《九思》竟成为王逸章句，荒谬已甚。今因张先生的考证，世人得以明白此事之原委。

张先生的版本学造诣常为人所称道的，是对《相台书塾刊正九经三传沿革例》作者以及相台本群经刊刻者的研究。

自明万历重编内阁书目定《九经三传沿革例》为“宋相台岳珂家塾刊本”以后，公私藏书目录等凡涉及《沿革例》者，皆以为出于宋岳珂之手，直至《四库总目》仍明人之说，称“宋岳珂撰”。清末目录版本学家若叶昌炽、叶德辉，率皆沿袭。至于传世相台本九经三传，因有“相台岳氏刻梓荆溪家塾”或“相台岳氏刻梓家塾”的牌记，后人更是肯定相台本即岳珂家刻本。

张政烺先生谓此说并无明确证据，乃后人推断之辞。后人之所以把相台本九经以及《沿革例》归于岳珂，是因为相台为岳飞原籍相州别称，而珂为飞孙中以文名者，所著《愧郗录》、《桎史》、《棠湖诗稿》又皆署“相台岳珂”。然《沿革例》的主要部分即总例七则，乃廖氏世綵堂《九经总例》原文，除卷之前后相台岳氏略有增附外，大抵保全原文，无所加减。此于标题下引文中的“旧有总例，存以为证”云云，明白可见，自来学者却习焉不察。

张政烺先生谓，相台本九经乃元初宜兴岳浚据廖莹中世綵堂本校正重刻，与岳珂无涉。首先，相台岳氏于《沿革例》引言中已经声明，所刊刻九经根据的是廖氏本九经。廖氏刻九经在宋度宗咸淳（1265—1274）年间。岳珂生于宋淳熙十年（1183），嘉熙四年（1240）珂已五十八，其卒年当距此不远，根本见不到廖氏本问世，更无论仿刻之事。其次，荆溪乃宋常州宜兴（今江苏宜兴）南之水，以近荆南山而得名。岳霖绍熙三年（1192）卒于广州，岳珂方十岁，侍母护丧北归，回江州（今江西九江）故宅，此后岳珂长期居此。可见，所谓荆溪家塾与岳珂绝无关系。《天禄琳琅书目》曲意弥缝，谓岳珂南渡后徙常州，没有任何根据。《天禄》又云宜兴有珂父霖墓，所据为府县志及《大清一统志》，实际是宜兴岳氏伪托。

有关岳浚，清人编诸姓氏谱及今人的人名辞典或有收录，然所采用资料皆不出明人编《毗陵人品记》所记。《毗陵人品记》的记载殊为简略，没有提到刻书之事。为此，张先生钩稽史料，作了详细考证，知其为宜兴人，县南有荆溪。宜兴岳氏上世为田家，无显达，并非岳飞后裔。至岳浚之诸父始为太学生，浚亦折节读书，友天下士。元大德年间，居住江州的岳飞后裔欲重修岳庙、岳坟，然财力不足，宜兴岳氏方豪富，有声望，遂与通谱，由岳浚等出资，以成其事。从此，宜兴岳氏得附相台郡望。

岳浚刊刻九经三传之事，在元人诗文中多有记载。郑元祐《侨吴集》说岳浚曾“延致巨儒，雠校群经，经诸梓，号为岳氏九经。”方回《桐江续集》也曾提及。据方回诗推测，刊刻时间当在大德年间，时宋亡已久，故书中不避宋讳。元末，因地方官吏无厌的剥削，以及战乱的破坏，宜兴岳氏皆零替不振，

岳刻九经书版也经战火而化为灰烬。

因阅世久远，传本稀少，廖、岳所刻经传为哪些，今人不甚了了。张先生分析《沿革例》，参以传本，定著廖刻九经书名为《孝经》、《论语》、《孟子》、《毛诗》、《尚书》、《周易》、《礼记》、《周礼》、《春秋经传集解》，岳氏于九经之外增刻《春秋公羊经传解诂》、《春秋穀梁传》，以及《春秋年表》、《春秋名号归一图》。

清张宗泰《鲁岩所学集》卷十一《跋九经三传沿革例》，认为岳氏所刻九经中当有《仪礼》。近代考究版本的学者，如朱学勤、张钧衡、叶德辉等，也都有类似言论，且称“三礼”有明嘉靖间重刊相台岳氏本。张政烺先生指出，此实皆欺世之谈。汉以来儒者但言五经，唐时立于学官者，《易》、《书》、《诗》之外，三礼三传分而习之，故为九经。宋神宗时用王安石言，废《仪礼》于学官。因此，宋之九经不包括《仪礼》，宋人鲜刻《仪礼》，岳氏刻九经也没有《仪礼》。

天禄琳琅旧藏中有《孝经》一部，展转归周叔弢先生。解放后，周先生捐献北京图书馆。因其中的藏书印记与相台本《论语》、《孟子》大多相同，《天禄琳琅书目续编》遂定为相台岳氏刊本，一至于今。张先生在文中提出疑问，指出现存相台岳氏本诸经卷尾皆有牌记，每叶栏外无耳题，此书行款虽似相台本，但卷尾无牌记，每叶栏外无耳题。又其版心所记刻工为“翁”、“寿昌”，即翁寿昌，这与世綵堂本《韩昌黎文集》刻工相同，其签字体势也完全相同。这些特征说明，此本《孝经》与廖氏世綵堂关系密切。不过，此本也有与廖氏刻本特征不一致的地方，比如，廖刻《左传》每卷后有牌记，此则无；廖刻韩柳文版心下方分二层，下记刻工，上刻“世綵堂”三字，所刻九经也当如此，此《孝经》版心刊工上层的界格虽存，而无“世綵堂”三字；此本于宋讳又全不避。由此判定此本《孝经》乃覆刻廖氏本，是在相台本、盱眙本之外的另一种刻本，覆刻时连同刻工的名字亦照样刻下。张先生的意见有理有据，值得注意。

张先生的这篇文章，纠正了以往的许多错误认识，相当精彩，其论断今皆已为定论。

张先生有关版本目录学的撰述虽然仅此两篇，但他在这一领域的丰厚素养却是有口皆碑。许多学者就这方面的问题向张先生请教时，都有“小扣辄得大鸣”的感受。先生版本学的独到见解往往见诸言谈之中。他对叶德辉版本学特点的认识就极为精当。他认为：“明清以来。除北京外，善本图书大多集中在东南江浙一带，虽然藏家有兴衰，书籍有转移，然大体不出东南一隅，故其地学者均真见有故籍，得详其行款格式、楮墨题识，著书则多为藏家簿录。叶德辉生于湖南，湘中藏书远逊江浙。虽然湘军将帅或有弃藏，然亦为同治军兴时得自江浙者，叶氏治版本，几于无米之炊，故其精力转致于辑录前人著作中论及版本者，著成《书林清话》一书，类似版本学教科书，其影响翻出东南簿录之上。”（刘宗汉《从〈读“相台书塾刊正九经三传沿革例”〉一文看张政烺先生的版本学成就》，载《古籍整理出版情况简报》1994年第5期）

张先生有关版本目录学的这两篇文章是我反复认真学习的。平时在研读、学习张先生文章的时候，产生了几点感想。

第一、包括版本目录学在内的所有传统文史领域的研究，不仅要熟悉传世古籍文献，而且应该关注各类出土资料，扩大史料来源。尤其在今天地下发现的资料日益增多的情况下，忽视出土资料来研究早期文献目录学，必然限制对某些学术问题的认识深度。张先生讲，“博与精的结合，旧文献与新史料的结合，是新时代治史者成长的最佳途径。”（《我在史语所的十年》，见《张政烺文史论集》第847页）这是经过亲身感受的宝贵经验，值得珍视。而《王逸集牙签考证》一文可以说是这方面的一个典型范例。

第二、张先生曾说过，研究选题应当着眼于较为重要的问题。他反对去钻那些太小而又没有什么意义的题目，强调写出来的文章要对别人有用。（见吴荣曾《我和先秦史及秦汉史》，收入张世林编《学林春秋》二编，朝华出版社1999年版）因此，先生的文章对相关领域的研究都能起到推进作用，引起人们的重视。他在版本目录学方面的撰述虽然不多，仅有这两篇论文，但所讨论的都是该领域的重要问题。这是我们应该学习的。

第三、古书版本研究当避免停留在表面，为习说所蔽。关于《九经三传沿革例》的作者问题即是显著的例子。现在想起来，前人只要稍微认真读一下《沿革例》前的引文，就不会得出岳珂撰作的结论。阅读一遍这段引文并非难事，许多搞版本研究的人竟然没有去做，先前是想当然，后来者则习于旧说，使这一明显的错误流传久远。至今有的著述里面仍然沿袭此误说，可见谬误一旦形成，其影响不易清除。

第四、张先生在学术研究上的无私奉献精神更值得我们学习。从事学术研究的人都特别珍视自己的研究成果，在论文发表前，一般不会公诸于众。《读〈相台书塾刊正九经三传沿革例〉》一文早在1943年就撰写出初稿。文章发表之前，张先生没有把自己辛苦读书得到的研究成果密不示人，相反，其观点很早就在友人之间交流。1960年，赵万里先生主持编纂《中国版刻图录》，即采纳了张先生的这一研究成果，纠正了过去将元相台岳氏刊刻群经定为宋岳珂家刻本的错误。而迟至1991年，《读〈相台书塾刊正九经三传沿革例〉》全文才正式发表。自观点正式公布于众，至论文发表，前后三十年，先生全然不计较个人名利的得失，不考虑有人会根据先生得出的结论、提供的线索，去查找资料，撰写、发表文章。这一点是大多数人难以做到的，令人敬佩。¹

我对张先生的学问了解得很不够，以上尽为肤浅之谈，希望大家批评指正。

（此文原刊于《书品》2005年第2期）

¹就个人所知，其他讨论“九经三传沿革例”作者及相台本九经三传刊刻者的论文，有：

翁同文《九经三传刊者考实》（法文），载《通报》五十一卷（1964年，莱顿）。

费海玘《翁同文九经三传刊者考实》，载《大陆杂志》三十一卷第七期（1965年）。

翁同文《“九经三传”刻梓人为岳浚考》（中文），载《大陆杂志》三十二卷第七期（1966年）。翁文此次发表，较之发表于《通报》者有所增改。

李安《翁著“九经三传刻梓人为岳浚考”读后》，载《大陆杂志》三十二卷第七期（1966年）。

乔衍璋《刊正九经三传沿革例序》，见《九经三传沿革例》（“书目续编”本，台北广文书局1977年初版，1987年再版）。乔序撰于1968年，采用了翁文的基本观点，并认为翁文乃得《中国版刻图录》启示而加详。

崔富章《刊正九经三传沿革例 作者非岳珂辨》，载《古籍整理出版情况简报》（总第205期，1989年）。